

翻译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费小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翻译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费小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的政治: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费小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3

ISBN 7-5004-5000-1

I. 翻… II. 费…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8921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特约编辑 宋凌云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费小平，男，1964年11月生，四川省叙永县人，研究生毕业，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在站）博士后，英语专业教授、硕导。发表过《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权力与反抗》、《对Tess“浙译本”的一些意见》、《弗洛伊德与当代“西马”大师》、《当代英语小说与海外华文汉语小说中的“家园政治”》等20余篇论文。

序 一

曹 顺 庆

我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费小平君通过自己的辛劳与汗水，于2004年6月底如期从四川大学毕业了，并被授予博士学位。穿上博士服，戴上博士帽，镁光灯频频闪烁，真神气。同时，他的博士论文《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经过修改就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双喜临门。他跟了我三年，作为他的导师我首先最衷心地向他表示祝贺！

此刻我想起了小平君与我首次见面的情景。那是2000年7月初的一个上午，与我素昧平生的36岁的他，为了考我的博士，背着行囊，气喘吁吁地专程从贵阳赶来成都见我。事先没有任何约定，尽管感到有点突兀，但我本人也是贵阳人，对家乡来的人总有些故乡亲情，所以在学院里热情接待了他。我们聊了一阵，他随后向我出示了他发表的一些翻译研究论文，刊物的级别还相当的高，如《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研究》等，并且他当时已是贵州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了。初次见面，我就感觉，小平君是一个能吃苦的人、有激情的人，憨厚、诚实，并且很谦虚，加之他是英语专业出身，有较好的英文说、读、写、译能力，又有不少有档次的学术成果，遂当

即表示欢迎他报考。他回去后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严格的考试于2001年9月被正式录取为我的博士生（方向：比较诗学），随即开始了我们之间永远的师生之谊。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认真学习我为他们开设的“《十三经》选读与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等多门专业基础课和学位课，还选修了其他老师开设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研究”、“欧洲小说研究”、“比较文学要籍导读”、“当代西方文论”课程和第二外国语（俄语），背诵《文心雕龙》也很认真，并时常主动与导师联系。与此同时，他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研读了大量的当代西方文论著作、译论著作以及部分中国学者的著作，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讲座和进行学术讲演，还积极关注着国内外学术刊物上的最新学术动态。最可贵的是，他居然每天以普通学生身份保持着赴图书馆、教室上自习的习惯。据他所说，他的很多文章、课程作业均是在这里写成，他太爱图书馆，太爱教室了。他可能是同届同学中上图书馆、教室最多的人。这表明，小平君是个实在的人，不做假，不粉饰自己，更不会给别人提出任何过分要求。他思维敏锐，对新事物接受快。正是因为这些，在知识架构上他很快实现了由一个纯外语人向跨学科人文学者的转型。读博期间，他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讨论翻译与文化问题的论文，在国内翻译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还参加了我主持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外比较文论史”十八、十九世纪部分）和一项教育部教改项目（“比较文学论”译介学部分）的工作。不仅如此，他宽以待人，尊师重道，淡于名利，作风正派，乐于助人，与他的师兄、师弟、师妹们相处得很投缘，几乎每周都与他们聚会、论学。又据石坚院长说，在四川大学他还有一个出色表现：他曾应邀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方向2001、2002级硕士生授课（2003年2月至6月），其灵活的教学

方法和通俗、生动的讲解深得学生喜爱，学生们至今都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答辩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争相前来为他捧场。听家乡的人说，他在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为硕士生上课，也很受欢迎。小平君除学术成就外，还有如此高的教学水平，为我这位导师争了光，我自然很高兴。

小平君的博士论文《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是我指导的博士生群体中第一部翻译专题论文，他也因此是我的第一位做翻译专题的博士。2001年9月至2002年9月期间，他就此选题与我谈过数次——或面谈，或电话，或E-mail。我当时之所以同意他做这一选题，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1）他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有责任研究异质文明间文学的误读、误译问题，也是我当时提出的“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命题中的子命题；（2）该选题有新意，因为国内尽管有人写过专题文章谈过这一问题，但对翻译的政治问题进行系统梳理、讨论进而形成一部大著，似乎没有；（3）他是学英文出身，有较好的阅读和理解英文理论著作的能力，适宜做这一西学味较重的课题；（4）他长期做翻译研究，熟悉国内外相关情况，特别熟悉国外文化转型之后的当代翻译理论；（5）他是学文论的，更加有助于将这一选题提升至学理层面，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翻译理论渗入了大量的当代文艺批评因子。很多文论家，如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谢莉·西蒙等，纷纷研究翻译问题。我相信，凭借他的敏锐与勤奋，他是能够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观点。他的开题报告顺利通过，并且在长达一年的写作过程中又不断地与我联系、讨论。论文写成后，虽然通过层层筛选与审查，但获得一路绿灯，并且刘象愚、王逢振、许钧、陆扬等知名学者对此予以很高评价。他“进京赶考”成功了。我多次表扬他。此时我又想起了他最后修改博士论文的日子。当时为了使

他的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更高一些，我曾严肃地指出了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学术规范问题，有时还会忍不住说上些不留情面的话。他坐在我新居的客厅的小沙发上，静静地听着，虔诚地点着头，但眼里似乎包蕴着尴尬。这确实是对他生活中真实的“考验”，因为他也在指导着硕士生。我对学生都是这样严格要求的。我的“顽固”使我面对另一个学生时，又会重复小平君坐在我客厅的那一幕。

小平君的论文采用政治学、社会学、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等新视角，通过研读大量的第一手英文文献，并兼涉部分中文文献，对翻译所导致的不同文化碰撞与文化对话中隐现或显现的权力关系进行了系统清理，并辅以比较文学层面上的学理阐发。它极具问题意识，我曾在《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上撰文大力倡导这种比较文学的问题意识。它可以避免我们学术思考中的盲点，增加一种实感，使知识成为身内之物，否则，一切“研究”均会成为无关痛痒的知识点。该论文不仅是一个翻译研究项目，同时也是一个文艺批评项目。二者合一构成了一个标准的文化研究项目。我曾说：“谁要通过翻译来做时尚的文化研究，就得读小平君的论文。”同时，全文立论公允，材料丰富，思路清晰，文笔顺畅，而且辅以个案分析，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

我个人最喜欢第二章和第三章，因为它们属于微观研究。这类用某种理论范式解决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扎实，有实际价值，避免空泛，深受学界欢迎，便于培养严谨的学风。“翻译中的性别政治”一章从清理性别问题的渊源开始，转而清理“翻译中的性别政治”问题，认为它们均源于悠远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后者的重大突破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女性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苏珊娜·洛特比涅尔-哈伍德、芭芭拉·戈达德、凯瑟·默泽、尼科尔·沃德乔夫等均为其活跃人

物。无疑，对性别与翻译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会给那些本是习以为常的领域带来出人意料的景观。该章所辖的“性别差异”、“身体翻译”、“女性译家与她们的男性作者之间的翻译关系”等议题均很有趣，特别是“性别差异”一节挖掘了介入特定社会政治活动的那些长期被压抑的、被遗忘的边缘化的西方和中国女性译家。这些材料在国内女性主义批评界、翻译界和比较文化界均为首次梳理，能丰富女性主义批评的话语范式，对于颠覆父权制象征秩序的二元对立和女性观念，创造一种女性经验透视，改变翻译史上妇女立于沉默和边缘的传统，谱写新的译界女性神话具有一定的价值。第三章“翻译的暴力政治与后殖民批评”同样很有趣，勾勒了一幅翻译的暴力政治的渊源、形成及成熟的画面。其中的“翻译与文化霸权”一节特别关注了那个传输翻译、建构翻译的社会历史语境，实施文化霸权的翻译同经济霸权密切关连着，为此提出了“翻译的政治经济学”命题。这一命题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我认为，最后一章提出的“重建翻译诗学”构想很重要，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借鉴了法国文论家梅肖尼克、美国学者威利斯·巴恩斯通、加拿大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的资源，并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文化研究”学科和 70 年代中期诞生的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的“翻译研究”学科为学理前提。这里的“翻译诗学”是指一种描写性翻译理论即译文中心的文化层面的翻译理论，它对于研究“如何选择一个文本作翻译”？“译者在选择作品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编辑、出版人或赞助人扮演什么角色”？“一个文本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得以接受”？“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有什么特征”？之类的问题极有意义。论文为此提出了“翻译诗学”的明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这部论著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足，但它有利于促使翻译讨

论走出就事论事的“忠实、通顺”的技术层面，有利于让学界意识到翻译是多元文化的审美实现，有利于拓宽文化研究的疆域，同时能为东西方文学关系史、意识形态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平台，更重要的是能为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研究、文类学研究以及接受美学研究提供一个丰富的视角。我认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是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小平君做人做事都是踏踏实实的，在很多人急功近利的今天，我们赞赏费小平君这样的年轻学者，并希望他继续扎扎实实，稳步前行，成为一个更加有成就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

是为序。

2004年8月于川大花园

序 二

谢天振

两年多前，看到许宝强、袁伟选编的一本《语言与翻译的政治》^①的译文集，翻开书的第一页，是孙歌写的一篇前言，其第一段第一行写的就是：“有关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是我们大陆学人思考中的一个盲点。”这句话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也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两年多后，我收到了费小平同志寄来的他刚刚完成并顺利通过了答辩的博士论文《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匆匆读毕整篇论文，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喜悦和莫大的欣慰。“盲点终于打破了”，我对自己说，也是对那本译文集的选编者和前言作者说。

当然，严格而言，盲点并不是从费小平同志的这一本博士论文起才开始打破的。且不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译学界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翻译的政治问题，并也已经发表了一些相关论著。即使就博士论文而言，在此前一年，我也已经读到了南京大学给我寄来的孙会军和葛校琴的博士论文《普遍性与差异性——后殖民批评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和《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

^①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翻译主体性研究》，前者借鉴了当代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文化理论之一——后殖民批评理论，以人类从事跨语言的翻译活动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对象——跨文化语境中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传译问题为切入点，从普遍性和差异性、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及杂合理论等多个角度审视译者对待原语文化中的差异性的态度及其处理方法，对翻译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种族和民族的自我主义进行解构和批判。后者对长期以来在翻译中一直处于一种毋庸置疑、不可动摇的主宰地位的原文中心说提出了挑战，该文运用后现代理论中的反主体思想作为理论依据，采用文化批评的模式，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主体性，凸现了译者的主体地位。接着，我又读到了大陆赴香港岭南大学攻读翻译学博士学位的查明建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诗学与文学翻译选择规范——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这些研究都已经涉及了翻译的政治问题，但是明确标榜“翻译的政治”、并从这一角度展开有一定规模、一定理论深度的专题研究的，费小平同志的博士论文也许可算是第一篇。

回顾最近一二十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当代国际级的文化学家、哲学家，像福柯、德里达、埃科、斯皮瓦克、埃文-佐哈尔、妮南贾娜等，都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与此同时，国际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像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韦努蒂等，都跳出了原先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的转换或两种文学关系的探究，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这个景象我们称之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们认为，这两个转向意义深远，值得我们国内比较文学界和译学界的人士认真重视并

进行深入的研究。

众所周知，自从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世界各国长达一两千年的翻译研究历史基本上都集中在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上的一些问题上的话，诸如翻译的技巧、策略，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风格等等，至多也就是讨论翻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也即译学界所称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那么，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翻译研究者的目光就不再局限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如符号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等。而且，即使是在当代西方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不可能一直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层面。譬如奈达，他从功能对等发展到动态对等理论，实际上也已经涉及了不同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成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一个趋势。正如已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也即是说，这一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

上而是穿行其中。”^①

当代翻译研究之所以出现文化转向的现象，并非偶然，这其中有着它内在的原因，这就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创造性叛逆。而它的外部原因，则是我们今天在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认识上已经不再等同于过去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就是把它仅仅看作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所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句中国古人对翻译的理解和定义主宰了我们（其实也不止是我们，其他国家的民族也一样）千百年之久。但是，今天，当我们把翻译放到跨文化的视野中予以审视时，翻译的内涵就大大地扩大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P. Brunel）等三人在他们合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中指出：“和其他艺术一样，文学首先翻译现实、生活、自然，然后是公众对它无休止地‘翻译’。”^②显而易见，他们这里所说的“翻译”就不再是指的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把翻译的内涵扩大到了文学艺术对现实、对生活和对自然的“再现”，扩大到了公众（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接受和解释。

其实，也不光是比较文学界，在译学界同样早就有学者从一种更广的意义上理解翻译的这种性质了。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就提出了“理解就是翻译”的观点，他说：“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无论是《圣经》里的‘列维传’，还是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③他的另一段话与

①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6, p.7.

② 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6页。

③ 乔治·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22页。

上述布吕奈尔等人的话更堪称异曲而同工：“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① 这样，“翻译”就成了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也也许完全可以这样说：哪里有交往，哪里有交流，哪里就有翻译。

在如此宽广的层面上定义翻译，可以说彻底刷新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费尔更是把翻译定义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从而把翻译视作与“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钻纂文集和读者指南等”一样，“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他甚至强调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因此，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② 把翻译理解为一种对原文的改写或重写（rewriting），理解为译者对原文文本的一种操纵或摆布（manipulation），这种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

由此可见，跨文化视野中的翻译研究是在一个比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内涵要大得多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往的层面上审视翻译、研究翻译的。对照人类过去一两千年的翻译研究史，这称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因为它开创了人类翻译研究史的新阶段。长

① 乔治·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23页。

② 参见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期以来，我们的翻译研究一直关心的就是如何在翻译中做到字当句对，如何做到使译文忠实于原文，如何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的信息。而当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让研究者的目光跳出了单纯的翻译文本内部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虽然这仍然是、而且也将永远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投向了译本以外的许多因素，诸如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同时从更深刻的层面对翻译的性质、定位、功能等问题进行宏观的理论思考。随着翻译在当代国际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翻译研究的越来越深入，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解码和编码过程，而是涉及源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尤其是涉及译者等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往行为。

而当我们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到译入语文化后，我们就会注意到在译入语文化语境里翻译与权力、与意识形态、与翻译赞助人（如出版社、翻译选题的审查部门等）以及与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等等的关系。正如勒菲费尔所指出的：“译作的形象受两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思想意识和当时在接受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译者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是否是某种赞助人力量强加给他的一种制约因素。思想意识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他还指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

之一。”^①

这时，我们也就会注意到许多原先我们没有注意到或原先无法圆满解答的一些问题。譬如，为什么在某个时期对某个作家、某个流派会译介得多，而对另一些作家、流派则很少甚至根本不予译介？为什么我们译介了那么多的西方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而西方国家则对我们国家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译介得那么少？为什么同一部外国文学的原作，在不同的国家却有迥然不同的遭遇——譬如《牛虻》，在苏联和中国几乎被奉为经典之作，“不胫走万本”，但在其他国家，包括在其本国，却要落寞得多？

再譬如，“译文必须忠实原文”的翻译观千百年以来，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并且是判断翻译好坏的毋庸置疑的标准，钱钟书甚至提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然而，就是钱先生本人，却对显然并不那么“忠实”的林译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觉得它们“还没有丧失吸引力”，发现“许多（林译）都值得重读”，而对于那些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却觉得“宁可读原文”。^②与此例异曲同工的还有：Coca Cola 的原文显然没有“可口可乐”的意思，但是“可口可乐”这个翻译却又被人们全都毫无异议地视作绝妙佳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再譬如，为什么即使是非常忠实、非常优秀的译本，也不能像原作一样长久地流传下去？我们以往都把这个现象归结为译本语言会“老化”。但是，为什么原文的语言就不会受到“老化”

^① 参见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② 参见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270页。